

邓小平对外经济开放思想探析

徐 向 艺

一、对外经济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

对外经济开放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几年来，邓小平关于对外经济开放思想经过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时期。

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剖析了长期以来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片面的、“左”的认识，科学地论证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①在邓小平等老一辈党的领导人的倡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方针正式确定下来。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指出：“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②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使用了“开放”这一术语，并且初步提出对外经济开放的内容，包括引进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发展外资企业等多方面。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更加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③这些论述，标志着邓小平关于对外经济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1984年以后，邓小平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反思，站在历史的高度，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加快对外经济开放的必要性和客观必然性，并把它确定为我党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邓小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闭关自守。他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④建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敌视和封锁政策，大大限制了我国与各国经济技术交流。50年代，我们曾一度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也中断了。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从事建设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我党第一次把对外开放称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同月，邓小平对这个基本国策又进行了更明确的说明：“对

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⑤。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期间，邓小平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开放思想，如提出进一步发展经济特区问题，扩大对外开放范围和开放层次问题，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问题等。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表明他对中国对外开放已是深思熟虑，也表达了他通过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国际化的决心。

进入90年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发生了变化。1992年初，针对有人对我国改革开放道路表示怀疑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⑥这一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是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⑦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否定观，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应该是辩证的否定，即一方面要否定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腐朽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继承、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和全部有科学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在对资本主义否定的基础上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至此，邓小平关于对外经济开放思想已具备了完整的内容，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二、中国对外经济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开放

邓小平不仅深刻论述了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及其基本准则，而且全面指出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形式和途径。具体地说，邓小平关于对外经济开放思想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邓小平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第一步是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1984年，他了解到我国对外贸易现状，对此非常焦虑：“现在我国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⑧1986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⑨邓小平认为，扩大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是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开放的突破口。这一思想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首先，开展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各国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缺陷；其次，开展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及生产成本相对差别的影响，获取比较利益；再次，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增加就业和使一国生产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增加就业，使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在邓小平扩大对外贸易思想的指导下，我党和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措施，如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建立若干有特色、创汇率高的出口产品加工区；实行和改进外汇收入分成制度；设立发展出口奖励基金；利用价格、汇率和关税等经济杠杆，鼓励出口产品的生产，等等。通过上述措施，我国对外贸易额得到大幅度增长。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仅为355亿美元，1993年增至1958亿美元，后者是前者

的5.5倍。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外国技术设备。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提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

“要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国资金进行建设。……要积极引进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有助于企业技术改造的先进技术，努力加以消化和发展，以促进我国的生产建设事业。”^②1984年，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③邓小平深刻指出了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是我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实践也证明，通过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第三，引进外国技术人才，利用外国的智力。1983年，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要利用外国的智力，把外国人请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办教育，搞技术改造。……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他们来，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既缺少经验，也缺少知识，应该把他们请来帮助我们。”^④这就把技术引进的范围扩大到人才的引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还为此作出决定：要通过多种方式和多种渠道，加强国外智力的引进。在产品开发、技术设计和工程施工等方面，加强与国外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是引进智力的有效形式，应当积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和党中央这一远见卓识，对于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尽快缩短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術差距，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邓小平针对我国企业制度过渡单一的弊端，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高度，指出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他说：“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⑤针对一些人对“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持怀疑态度，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巡视时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⑥在多处场合，邓小平全面论述了“三资”企业的性质、地位及发展的步骤和原则。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关于发展“三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使“三资”企业获得了迅速、健康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建立和发展经济特区。邓小平是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早在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以后，党中央做出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决策。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对特区的性质、作用和战略地位、发展方向作了更科学的概括。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他还说：“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⑦我国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科学论断。通过经济特区，扩大了我国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范围；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培养和锻炼了各种专门人才；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第六，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一些经验之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战略思想。1984年2月，他在对广东、福建视察后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①根据这个思想，我国政府随即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决定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同年国务院批准进一步将唐山、丹东、沈阳、南京、威海、烟台、杭州、梧州等20多个市及所辖县建为经济开放区。这样，在我国就初步形成了“内地——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为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第七，中国对外开放要向一切国家开放，向不同类型国家开放。邓小平站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③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形式、措施，体现了一种全面开放、大开放的气魄，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拓展，地域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实践证明，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战略，既适应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又符合我国国情。

三、对外经济开放必须坚持四个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建立和发展对外经济开放理论的过程中，提出我国对外经济开放必须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即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为目标；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要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个基本原则的提出，使邓小平对外经济开放理论更加完善。

第一，对外经济开放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标。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对外经济开放是手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其根本目的。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指出判断对外经济开放以及其他一切工作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最根本的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按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不断扩大对外经济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对外经济开放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⑤这一基本原则，是从我国多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制定、贯彻对外经济开放的方针、政策时，始终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点，通过对

外经济开放，进一步提高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在今后对外经济开放的事业中，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基本方针。

第三，对外经济开放要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邓小平在多次场合都明确指出，我们向外国学习，要始终保持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能一强调吸收、借鉴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就以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我们在学习、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有用的文明成果的时候，还要坚决抵制国外腐朽东西的侵蚀。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①②}对外国的东西照搬照抄，甚至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种妄自菲薄、盲目崇外的心态，也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于“全盘西化”的倾向和观点，更应防止和警惕，不能让它干扰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方向。学习借鉴外国的经验，必须经过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是我们对外经济开放不可动摇的一条方针。

第四，对外经济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③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实行对外经济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探索，不断完善党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成效地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①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8、310页。

③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90、64、65、79、373页。

⑨《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6卷，第48页。

⑩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159—160页。

⑫《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87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32、138—139、373、51—52、52、78、237、63、3、3页。

㉔《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32页。

· 书讯 ·

《中国经济法制史》一书出版

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学系蒋晓伟讲师撰写的《中国经济法制史》最近已由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是一本较全面论述中国经济法制发展史的专著，全书共分四编二十二章，自分元前21世纪夏王朝出现开始，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历史阶段的经济法制状况，作了较

完整、系统的论述，具体涉及土地法、赋役法、商税法、矿冶法、盐法、酒法、茶法、钱法、钞法等十余种主要经济法的发展与变化、特点与性质、意义与作用等等。此外，书中的“绪论”及各章“小结”还对中华法系及中国经济法制史的特点及形成原因作了概括论述。

（张新渭）